



# 北影纪事

杨远婴 主编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北影纪事

杨远婴 主编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影纪事 / 杨远婴主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106 - 03340 - 8

I. ①北… II. ①杨… III. ①北京电影制片厂—概况  
VI. ①J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050 号

## 北影纪事

杨远婴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1 插页/4 字数/52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340 - 8/J · 1262  
定 价 80.00 元

## 前 言

涉足北京电影制片厂研究还是囿于电影史学的想法：考察居于中心位置的地域电影，了解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的结构变化。

因为综合地涉及了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所以这个题目的探讨也是一个逐步聚焦的过程。

首先把“北影”的具体考量对象设定为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创作人员及决策领导者。

其次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发展、转制的历史过程中整理其实施过程。

最后将表述内容构建为两个部分：产业、创作、人事变动的线性描述和代表性人物的访谈。

在“北影”六十年的梳理中，地域意义消融于意识形态表征，作为国家首都，北京的空间地标首先是其皇权象征，所谓的京城符码常常显现为政治的风向标。20世纪的中国确乎是社会斗争的角力场，而北京始终是桥头堡，离开这一历史事实，“北京电影”只能是空洞的能指。

本书的另一个必须面向是电影生产方式的演变：向苏联电影取经，由“北影”而“中影”，其创建和改制彰显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折过程。所以我们的探研依从电影生产的规则——试图勾勒不同时间段内北影创作在布局策略、影片类型、导演群落、明星样貌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

借助地域框架，将大电影史转换为断代史，细化研究对象，使宏观电影史论切割为更为集中的微观阐述，这是我编撰此书的原始动力。但当全书最后完稿的时候，我蓦然觉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60年历史依然是个宏大课题，此次的梳理与描述仍旧是未来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材料，相对于百

年,它是断代,相对于局部,它还是整体。

在此书交付出版的时刻,我要特别感谢王好为导演,身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杰出导演,她充满情感地向我推荐应该采访的北影前辈,介绍他们的业绩,提供他们的联系电话,使我的工作迈开了切实的第一步。对影坛老人们的访问大大丰富了我对中国电影方式以及北京电影构成的理解。

我也由衷地感谢我的工作团队,我们共同潜心于这个题目——搜集资料,外出采访,关门讨论,写稿改稿……尽管进入的时间与投入的精力各不相同,但前后持续三年的浸润提升了每个人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并凝结出纪录与评说的文字。这些一起走过的同仁是:丁宁(第一章),陈华(第二章),范蓓、汤俊(第三章),黄欣(第四、第五章),陆嘉宁。

“北影”研究是个边界广阔的课题,而我们的概括和评述显然仍是初级作业,等在前面的,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深究的行业命题。

杨远婴

2010年

# 目 录

<b>第一章</b>	1
一、北京：新中国的电影中心	1
1. “中电”三厂等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收	2
2. 从晋察冀到北平	4
3. 从东影到北影	5
4.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中心位置	7
二、新闻纪录片起家	9
1. 新闻纪录电影：电影战线上的轻骑队与前哨兵	9
2. “人民电影先锋队”	12
3. 宣传新中国	13
三、故事片的初创	16
1. 莫测的创作环境	16
2. 创作力量的汇聚	18
3. 新政策的影像普及：《一贯害人道》、《赵小兰》等	20
4. 书写革命战争史：《新儿女英雄传》等	21
5. 知识分子的改造：《民主青年进行曲》与《走向新中国》	25
6. 惊险样式的先河：《智取华山》	26
四、向苏联电影取经	30
1. 中苏电影工作者的第一次合作	30
2. 赴苏联实习团	32
3. 苏联专家的讲习班	34
4. 协助北影建新厂	36

5. 新北影及《祝福》的彩色亮相	37
五、戏曲片的文化传承	40
1. 吴祖光的旦角艺术纪录	41
2. 岑范的京剧三部曲	45
3. 第二创作集体的戏曲片创作	47
4. 戏曲片摄制的“北影模式”	52
六、影像写实的规训	54
1. 泛政治化的现实语境	54
2. 被拔的“白旗”：《上海姑娘》和《生活的浪花》	57
3. 被规训的现实：《探亲记》的重改风波	62
4. 浪漫化的现实：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65
七、金字招牌的打造	70
1. 四大帅与四个创作集体	70
2. 誉为精品的献礼片	73
3. 倾力制作的名著改编	78
4. 少数民族的影像塑造	82
5. 歌舞纪录的硕果：《东方红》	85
6. 璀璨的二十二大明星	88
7. 汪洋为核心的行政领导	96
八、北影厂的北京呈现	100
1. 北平的革命历史书写	100
2. 从北平到北京的意识形态更迭	104
3. 作为首都的明信片	107
九、政治风暴前的影事征兆	110
1. “反党电影”《红河激浪》	111
2. 对《早春二月》的公开批判	112
3. 《浪涛滚滚》的再次触礁	114
4. 《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成为“毒草”	116
5. 对《烈火中永生》的严格审查	117
6. “十三年”与阶级斗争书写	120

<b>第二章</b>	127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127
1. 江青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27
2. 《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30
3. “斗、批、改”对北影厂的冲击	132
4. 北影厂的搬迁与重建	133
二、革命样板戏的拍摄	135
1. 样板戏美学的开端：《智取威虎山》	137
2. 样板戏电影的镜头、景别、“十六字方针”以及“出绿”概念	139
3. 《红色娘子军》中体现的“三突出”原则	142
4. 《龙江颂》、《海港》、《杜鹃山》的拍摄	144
三、“文革”后期的故事片创作	148
1. 1973 年之后的小高潮	148
2. 《海霞》事件	153
3. 《决裂》的制作	158
4. “反击右倾翻案风”	160
5. 《反击》的制作以及“四五”事件	162
6. “文革”时期电影总体的生产与发行	163
7. 电影“文革”的告终	165
<b>第三章</b>	167
一、电影的拨乱反正	167
1. 戴着镣铐跳舞：《春天》、《大河奔流》	170
2. 伤痕和反思：《泪痕》、《柳暗花明》、《婚礼》	176
二、语言创新之路	181
1. 理论探讨	181
2. 实践摸索	184
3. 《小花》的尝试	186
三、“三代同堂”	189
1. 老一代：改良旧方法	189
2. 中生代：寻找新视角	195



3. 青年导演:影像革命	212
四、名著改编的传承与困境	217
1. 重拾改编	217
2. 十年成果	219
3. 《红楼梦》的逆转	229
五、合作拍摄初探	235
1. 中日合作:《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236
2. 京港合作:《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238
3. 中欧合作:《马可·波罗》、《末代皇帝》	241
六、寻求娱乐效应	245
1. 喜剧片	246
2. 武打片	250
3. 惊险片	254
七、再次遭遇困顿	258
1. 体制改换	258
2. 电影变脸	266
3. 电视冲击	269
<b>第四章</b>	271
一、大变动的前夜	271
1. 开始变化的生产环境与制作观念	271
2. 商业片再现	273
3. 合拍片救市	275
4. “主旋律”高扬	277
二、走向市场经济时代	280
1. “3号文件”	280
2. “江苏突破”	281
3. 向现代企业模式转化	283
4. 危难中的国营电影制片厂	285
<b>第五章</b>	289
一、变革的真正到来	289

1. 电影产业集团化	291
2. 从“北影”到“中影”	295
3. 多种资本经营	300
4. 重塑北影金字招牌	302
二、新体制下的电影诉求	304
1. 不断推出新人	304
2. 突破题材限定	309
3. 打造完整产业链条	316
<b>结 语</b>	337
1. 国家电影与工农兵书写	337
2. 政治话语的影像表达	339
3. 从“文艺复兴”到“黄金时代”	339
4. 商业大潮下的娱乐转向	341
<b>附录 1 访谈录</b>	345
洗印师王雄访谈	347
特技师张尔瓚访谈	376
剪辑师傅正义访谈	389
老制片王志敏访谈	402
导演谢铁骊访谈	410
摄影师李文化访谈	422
导演王好为、摄影师李晨声访谈	432
导演黄健中访谈	441
原北影厂副厂长现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史东明访谈	449
<b>附录 2 北京电影制片厂影片目录</b>	461

# 第一章

## 一、北京：新中国的电影中心

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上海发展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上海电影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北京虽然是《定军山》的诞生地，那时却不能和上海比肩。然而，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古都北平地位的凸显，中国电影与北京的关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崭新的一页。

早在 1946 年 10 月 1 日，“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宣告正式成立”<sup>①</sup>，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电影事业的核心。在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参与领导的“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sup>②</sup>也成为进步和革命的阵营。当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北平作为新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凸显出来。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争夺的焦点转移到大城市。随着平津战役的打响，毛泽东开始部署接管北平的诸多事宜。194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统筹北平接管工作。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古老的帝都免于战火，完整保存。从 1949 年 2 月初开始，北平接管工作在叶剑英和彭真领导下全面展开，这一切都为新中国定都

---

①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3 页。

②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6 页。

北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此背景之下,毛泽东正式提出定都北平,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电影事业的建设也开始了全盘的规划。

1948年9月和12月,袁牧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讯,在陈波儿的协助下,两次以书面形式向中宣部汇报“东影”的形势,为全面夺取政权后的电影事业献计献策。他在《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二)》中指出,“北平解放后,当奉示即于中宣部领导下,建立电影事业的统一领导机关,成为日后国营电影企业的中心……在中心领导下,应有一直属厂,使中心不脱离生产太远,并随时总结全国各厂经验交付该厂实践,当为重点来培养该厂为第一种国营厂中之典型,以便再推广到全国各厂,故北平厂之前途应是这样的重点……在最初阶段,领导中心虽在北平,而制片厂重点将看北平厂之整顿组织等所化费时间长短,以决定重点转移之快慢,可能最初还以东影为重点,或同时两个重点,最后才能将重点完全转到北平。”<sup>①</sup>根据袁牧之的报告,中共中央在1948年12月发出《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对全面夺取政权后的电影事业做了周密部署和全面安排,其中第四条指出:“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平。”<sup>②</sup>中共中央的这些战略性指示预示着人民电影事业将有计划、大规模地步入正轨。

从1948年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段时间里,各路人马汇聚北平,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中共中央的统筹下开始了有序的组建工作。

### 1. “中电”三厂等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收

“中电”三厂(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三分厂),其前身为北平的“伪华北电影公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收,接收“大员”徐昂千自任厂长。<sup>③</sup>“中电”三厂设备比较简陋,有三个设备较好的摄影棚和一百多名职工,除拍摄故事片外还拍摄新闻纪录片,如新闻片《中国新闻华北版》以及《黑夜到天明》、《天字第一号》、《圣城记》等故事片。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当局企图将“中电”三厂的电影制片设

---

① 《人民电影的奠基者——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纪念文集》,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② 转引自周啸邦主编:《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③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备及物资南运,同时解雇部分工人。<sup>①</sup> 在以中共地下党员侯瑞霞等人为核心的北平地下党“中电”三厂党支部的领导下,“中电”三厂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和工人积极开展罢工、反遣散、反迁厂等护厂斗争,成功地保护了该厂的一些技术设备、器材和厂房。这为后来对“中电”三厂的接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田方

中共中央在1948年12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对北平电影机构的接管做了部署,其中第二条指出:平津不日即可解放,北平“中电”三厂、影片经理机关及影院七个要去接收,由东影派去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下工作,此项接收干部立即前来。<sup>②</sup> 1948年12月19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出了秘书长田方及赵伟等10人进入北平,在良乡集中学习。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了对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管工作,田方等人以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军代表的名义,进驻“中电”三厂、中电华北服务处。2月4日,马彦祥、田方、翟强在中电华北服务处(即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业务处)主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实行军事接管的几项决定:(一)全部人员不动,保持原职原薪,一切工作照常进行。(二)将华北服务处改为“北平电影服务处”,原主任祁化民继续留任。(三)军代表主要成员分工:马彦祥负责全面工作并主管北平电影服务处,田方主管“中电”三厂(后改为北平电影制片厂),翟强主管国民大戏院等。<sup>③</sup> 于是,田方作为“军代表”进入“中电”三厂主抓入城后的政策教育,“他依靠地下党组织,调查研究该厂的情况,特别是对该厂的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他觉得: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思想教育就更为重要,如何体现党的政策,如何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加强党的领导,是首要的工作。为建厂做准备,他首先做人的工作,和职工们打成一片,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逐家逐户地进行家访,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逛颐和园,通过生活的接触,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然后组织读书会,和他们一起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终于,人心稳定了,除了原国民党的厂长以外,全套人马,

① 白安丹、吴凡主编:《北京电影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②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③ 参见《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上)》,北京市电影公司1995年版,第11页。

都留了下来。”<sup>①</sup>在北平军管会的领导下，国民党的“中电”三厂、“中制”北平办事处、“中央电影服务处华北分处”和国民大戏院、大华电影院、大都市电影院、中国电影院、北洋电影院等九家电影院全部被顺利接收。

## 2. 从晋察冀到北平

解放战争初期，在华北军区政治部领导下以及东北局及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于1946年10月在河北成立，由汪洋担任队长，这是“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所有的设备都经过改装安装在一辆畜力牵行的大车上。这辆大车长时期奔驰在冀中平原，随同部队到前线去进行新闻电影摄制，拍摄了不少珍贵的有关华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素材。

1947年5月，华北电影队为了制作影片的需要，带着改装后的设备，在安国县中央村安顿下来一个时期，不久，又随军转移，先后和平山、定县、兴国等地建立了新闻摄影据点。同年11月，石家庄解放，华北电影队就在石家庄建立起了较固定的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由华北军区政治部领导。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摄影队和放映队又有所扩大。1948年秋，“东影”根据党的指示，派吴本立、张永、高振宗、翟超分别负责四个摄影队，在吴本立带领下，通过海上的敌人封锁线，到达华东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新闻片拍摄工作。华北电影队和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期里，克服重重困难，拍摄出了新闻片《华北新闻》（又名《自卫战争新闻》）一至三号，以及新闻素材《晋中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sup>②</sup>

1948年底，汪洋接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发展电影事业向各野战军政治部抽调干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是：由华北局调群众剧社，为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制艺术片之骨干。<sup>③</sup>1948年12月19日，华北电影队派出的翟强等陆续进入北京，和东影厂派出的田方等人一起准备接管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根据党的指示，一面继续派摄影队在前方进行新闻电影素材的拍摄，一面会同“东影”一起进行了对国民党在北平的“中电”三

① 颜一烟：《烽火明星》，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②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

③ 苏叔阳、石侠编撰：《燃烧的汪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厂的接收。<sup>①</sup>3月15日,汪洋先行到达北平,4月22日华北电影队全部技术人员和创作干部三十多人从石家庄开赴北平,并入即将成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以便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迎接全国解放而培养大批建设新中国的干部。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成立,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其中的第三部为文艺学院,培养文艺干部。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1949年11月,中央宣传部决定抽调华北大学文工团部分人员支援电影事业,陈怀皑、马林等19人由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第三团调入北影厂。

这样,晋察冀解放区的电影创作队伍基本转移到了北京。



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和原北平“中电”三厂部分人员合影

### 3. 从东影到北影

作为人民电影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伊始就汇集了延安和东北解放区的大批老干部,成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和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东影不仅摄制了大量新闻纪录片,试制了美术片、科教片以及短故事片,并为创作长故事片进行了一系列基础准备工作,同时也为全国解放后电影工作的大发展,储备了大批干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sup>②</sup>。

①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②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袁牧之在1948年9月所做的《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一)》中指出,待东影迁回长春厂址后定为“暂时重点”,待中央定都后,长春只作为分厂而重点应移至京都,直属中央,成为中心。<sup>①</sup>在《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二)》中,袁牧之又指出东影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干部,“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干部才能最快成熟,故在北平尚不能生产前,从各姊妹艺术中调来之干部将先来东影,这是老干部。关于新干部之培养则现第四期训练班,已批准四百人,招生两月。”<sup>②</sup>随后,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对东影当时的工作做出指示,除了让东影派出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下接收“中电”三厂外,还指示东影“把摄影队派到前线去争取拍好许多纪录片,并应在华北就近制片,以求迅速”<sup>③</sup>。在1948年8月,东影派出了以吴本立为总领队的第一批进关摄影队,从1948年12月开始又先后派出刘德源、石益民、葛雷、韩秉信、张沼滨、郝玉生等负责的六个摄影队进关。后来,这些摄影队连同其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一并转入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1949年3月,东影的负责人袁牧之安排好东影的工作后,奉中宣部命令离开兴山前往北平,筹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1949年4月初,由钱筱璋率领的东影新闻片组及最后一批进关的新闻摄影队共41人抵达北平,并入筹建中的北平电影制片厂。

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后,东影继续向北平输送专业人员及干部。东影第四期训练班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后于1949年6月结业,东影随即选调20多人支援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新闻摄影队伍。1949年7月,东影厂制作处处长罗光达、放映科科长罗光、宣传科科长李芒等7人奉命调转进京,负责筹建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与此同时,东影厂照相科吕厚民等7人根据电影局指示调入北平电影制片厂。同年9月,东影厂音乐组的李季达、赵宪庭、吴本成等22人调入北平电影制片厂。<sup>④</sup>据不完全统计,东影从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年时间里,共调出干部285人,为建设新厂做出了贡献<sup>⑤</sup>,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到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

① 参见《人民电影的奠基者——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纪念文集》,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② 同上。

③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④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⑤ 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制片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北京电影制片厂初期领导人(左起:程默、钱筱璋、关志斌、罗静予、田方、钱江)

#### 4.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中心位置

1949年4月20日,军管会宣布,将文管会电影处在北平接管的电影机构及其所属的人员和资产,全部移交给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管理;上述这些单位的军管阶段宣告结束。<sup>①</sup> 经过两个多月的接管以后,“中电三厂”由军管会正式移交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成为“北平电影制片厂”,田方、汪洋分别担任正、副厂长。4月20日上午,北平电影制片厂召开演职员工全体大会,由军管会代表马彦祥讲话,就军管会接管“三厂”工作的结束作了简要报告,并鼓励原有人员,希望大家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做出更大成绩。厂长田方指出:目前北平电影制片厂主要是摄制新闻纪录片,现已有大批新闻摄影队随军南下。副厂长汪洋在报告中着重阐明团结问题;改造旧的工作态度与生活作风问题;

<sup>①</sup> 周啸邦主编:《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